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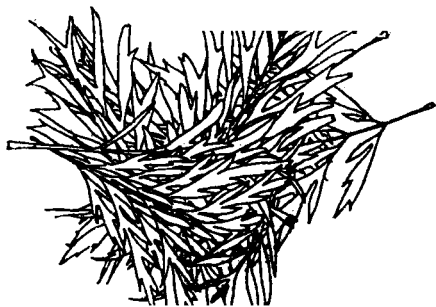
凄怆的镜子

成出版社

王西彦

凄怆的镜子

王西彦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内 容 简 介

王西彦是我国当代以描写知识分子命运著称的老作家。这本小书选的几篇文章中的主人公，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作者将书名叫作《凄怆的镜子》，实有深意存焉。因为鉴古可以知今，鉴人可以知己，相信每个读者都能在这面“镜子”中窥到自己一些影子。

凄 怆 的 镜 子

王西彦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2插页 65,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000册

ISBN 7-5360-1238-1/I·1098

定价：2.60元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

(代序)

编辑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是我们《随笔》杂志同仁怀抱经年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近些年来，由于受经济上亏盈的制约，出版社想出版亏本大的套书，已颇为艰难。出这套小丛书，每种几万字，薄薄的一小册，即使赔本，出版社目前也还赔得起；书小而薄，价钱不高，一般读者也买得起。如此避难就易，总还可以奉献出一些我们自以为于读者、于社会或多或少有点益处的书。这也是一种“聊胜于无”吧。

这套小丛书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一曰：精。小丛书的作者们，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早已逾“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作家。他们也是《随笔》的老作者。他们饱经沧桑，承继着我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报国忧民的意识与责任感。我们深感幸运的是，在结束“文革”和“拨乱反正”，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老作家中的不少人青春焕发，成了我们

的良师益友。十二年来我们在《随笔》编辑工作岗位上，一直得到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恳切的鼓励。他们经常把自己的佳作惠寄《随笔》刊发。现在收入这套小丛书的许多作品，就都是先在《随笔》发表过的。我们有幸充当了它们的最早的读者，曾为之感动甚至击节过，并从中汲取教益和精神营养。

二曰：真。首先，真，即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也是这套小丛书的各种作品的实在内涵。古人有云：“言为心声。”经受过“左”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磨难，深谙“假、空、大”之害的老作家们，在他们的散文篇章中，总是力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貌，力求讲真话，讲出自内心的话。诚然，真话不等同于真理，但真理却永远跟假话绝缘，与真话相连。在这些小册子里，他们只有未说或言犹未尽或有所保留的真话，但绝无掺假说谎。再说，这些作品的“真”，还表现在作者对真理的执著的探索和追求。正如巴金所说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道，这些小册子都是阅世久深、甘苦备尝的作者们直面人生，袒露心灵，

孜孜矻矻地追求美与光明的真实记录。

三曰：杂。这是就小丛书的题材品种与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而言，即在写作上没有任何特定划一的框框，东西南北，海阔天空，鱼游鸟飞，各展其长。体现了散文领域的无比宽广，我国散文是极其自由的文体。这套小丛书中，有记事忆旧，有迷人状物，有抒情写景，有旅踪行草，有杂感随想，有读书漫笔，有生活琐拾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但杂中有同，多样中有一致。这套小丛书繁杂多样的作品里，老作家们各各展示自己个性的同时，有个一般中年、青年作家尚没有或尚未达到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学识修养的广博富有，写作功底的深厚扎实，文笔的老到、精练、优美，遣字用词的准确、鲜明、生动。可谓异彩纷呈，珠玉连篇。其中不乏真正的美文佳构。

以上所呈，皆属管见。因仓促间请不到合适而又愿意为这套小丛书写序者作序，我们只好斗胆急急草成此篇小文，权充“滥竽”。诚惶诚恐，谨乞正于各位老行尊和读者朋友们。

《随笔》编辑部

1991年夏暑未消时于广州

目 录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 （代序）	1
在锤子和铁砧之间	1
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	31
失落的和寻找到的	89
迟暮的怀念	113
附录：	
折翅的鸟和网里的鱼	132
后记	144

在锤子和铁砧之间

1988年《随笔》第三期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高尔基的文章。一篇是黄秋耘先生的《历史的哑谜》，里面提到1986年6月间高尔基逝世时，根据苏联政府发布的公告，他是被三位给他治病的医生暗害致死的，他们都以“医学谋杀”的凶手的罪名锒铛入狱。“但如众所周知，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染上了肺结核病，死后解剖尸体的检验书表明，他的肺已烂掉了一大半，只有三分之一还能正常工作，当时他已达到六十八岁高龄，任何一个医生都知道，像他这样的病人，即使千方百计救治，也活不了多久，根本没有必要加以谋害。况且高尔基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与当时发生在苏联最高层的政治斗争没有什么牵连，这三位名医又是从来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他们没有理由要置高尔基于死地。”因此，高尔基的死因就成为一个“历史的哑谜”。接着

作者又写道：“关于高尔基之死的疑案，直到斯大林逝世后好几年才得到平反，但也只是说这是一个假案，高尔基的死是自然死亡，这三位医生是无辜的，不负有任何刑事责任。对当时给他们罗织罪状的前因后果，却仍然讳莫如深。”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哑谜”也依旧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另一篇是刘思先生的《假如高尔基还活着》，作者读了一本曾任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的逃亡者所写的《斯大林肃反秘史》中《买不动的高尔基》一章，说到斯大林一直想设法要高尔基写一部《斯大林传》，因而“在对高尔基物质享受关怀的同时”，“斯大林的恩赐雪片似地向高尔基袭来”，“在很短的时间内，高尔基得到了世界上任何作家都不敢想的荣誉”，“但时间在流逝，高尔基仍然没有动笔写歌颂斯大林的那本书，按他对自己活动的安排，根本不像要动笔写《斯大林传》的样子”。于是，斯大林又退而求其次，“决定让高尔基写篇文章，标题为《列宁和斯大林》，内务部领导人判断，这次邀稿高尔基是不会拒绝的，但高尔基出乎他们预料地坚定地拒绝了。”这位逃亡者认为斯大林和内务部负责人把高尔基估计得太简单了：

“高尔基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与天真，作家那锐敏的眼睛已渐渐地透视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他了解苏联人民，从他们的一张张脸上，他读到了一本本打开着的书。他窥测出人们在经受一种怎样的感情，是什么使他们困惑与不安。高尔基早已看清，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假招牌笼罩下的是饥饿、奴役和强权暴力。”这自然是对高尔基的最高赞颂，以致使得《假如高尔基还活着》的作者情不自禁地写道：“这正是我心目中的高尔基！记得早年读过高尔基书简，有一段话印象极深：‘我以为，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上是自由的，必须仅仅是代表自己、为了自己、关于自己才说话的，同时对自己所说的一切要负责。’（1899年11月23日致伊·叶·列宾，着重点为原文所有）同一封信里还有这样的话：‘不屈服于任何人——这是一种幸福，难道不是吗？作自己灵魂的主人，不许那些无耻地捣鬼的异己东西进入自己的灵魂——这好不好呢？’假如高尔基还活着，我们可以这样回答：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敬爱的高尔基同志，你获得了‘不屈服于任何人’的幸福，你没有让‘那些无

耻地捣鬼的异己东西进入自己的灵魂’，也就没有玷污自己的名字——好！”于是，这位好心的作者一连作了四次“假如高尔基还活着”的美好期望，甚至认为这位获得了“不屈服于任何人”的幸福的可敬爱的作家可能会“以他一贯对中国事情的关心，一定会赞赏巴金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可是，这位作者却也不得不提到《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所报道的一件事，就是高尔基曾经受命视察过一座“发生的惨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劳改营，而高尔基把这座劳改营的‘情景’说成是‘美好的’。”对于这件显然与“不屈服于任何人”的幸福完全不相符的事实，我们的作者只好再作一次假定，认为高尔基也一定会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因而慨叹说“‘假如高尔基还活着’是篇永远作不完的文章”了……

在这里，我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抄摘上引两篇文章中的段落，是因为它使我回忆起自己对高尔基的感情的变化，并对这位素所敬仰的革命作家的晚节和死亡也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在青年时代，和大多数中国读者一样，我

对被称为“革命文豪”的高尔基怀有真诚的崇敬。这种感情，自然和对第一个出现在世界上的苏联新社会的热望不可分。当时在我的眼睛里，苏联是全人类的希望，是投射在黑暗尽头的耀眼的明灯。而高尔基，他是一只为新世界的诞生而歌唱的海燕。我不仅敬仰他伟大的人格，而且热爱他鼓舞人心的作品。我所读的第一部高尔基的作品，就是长篇小说《母亲》。当时我是一个高中程度的师范生，1930年左右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蓬勃兴起，我在浙江省城杭州一家小书店里买到了这本横排红封面的禁书，就贪婪地读了它，被书里描写的那位母亲尼洛夫娜的命运所强烈地吸引，她在儿子巴威尔引导下走上了改变旧世界的革命道路。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母亲》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界，而且一面读小说，一面就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找印证。这样，这部小说就成了一把开启我生活秘密的钥匙，使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生活严峻的真理。”尤其是，当我有机会接触到工人时，竟然因《母亲》而对工人生活发生兴趣，自己也大胆地写了一篇描写工人斗争的短篇小说。也就在这

篇回忆文章的最后，我满怀激情地写道：“我要说，高尔基是我永远敬佩的一个伟大作家，**《母亲》**是我永远感激的一本好书。”不过，情况虽然是这样，由于自己毕竟并不太熟悉工人生活，**《母亲》**给我的感动还是偏于理性的。当我随后读到高尔基三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时，感受就更其亲切了，因为出现在那里的人物，简直就像是自己曾经认识的。我在一本回忆录的序言里写道：“早年读高尔基的**《童年》**时，对那里面所描写的一些悲惨的人和事，有过很大的激动。出自作者笔下那一群悲苦不幸的人，如像瞎眼的老匠人，外号叫做‘兜里装着死鬼’的傻子乞丐，蓬头散发、喝得烂醉、总是时而唱着猥亵的歌子、时而哭泣着叫喊‘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儿呵’的放荡女人，还有经常挨男人毒打的外祖母和舅妈，总是不断地重现在我的梦境里。我对这些人物不仅并不陌生，还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童年》**里面的人和事因和我童、少年时期的经历很有些相似，读它时往往使我沉溺在对往事的回忆里；**《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里面描述关于读书和学

习写作的情形，给了我无穷的兴味。也就在那个时期里，高尔基的一些短篇名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伊则吉尔老婆子》、《我的旅伴》、《马尔华》、《草原上》、《一个人的诞生》和《秋夜》等等都成为我们年青人最为喜爱的读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二十六个和一个》的中译文发表时，作品中那个十六岁的骄傲的女工塔涅向二十六个被锁在潮湿的地窖里的面包师傅们要薄饼儿并尽情嘲笑他们，而他们却把她看作自己崇拜和钟爱的对象，但结果她竟然被一个穿着天鹅绒背心的漂亮的兵、一个在另一间宽敞明亮的面包房的新来的司务轻易地抓走了，这个不公的结局给予我们的触动是那么强烈，使我们陷入久久的沉思。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说这篇作品里所描写的，就是他在喀山一家面包作坊里做工的那个很痛苦的时期，这一点更增加了我们对它的珍视。而高尔基那两篇散文诗《鹰之歌》和《海燕》，我们几乎都能够背诵；那只和蛇搏斗的鹰和在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成为鼓舞年青人勇敢前进的象征。就我个人来说，高尔基描写流浪汉的初期作品简直使自己沉醉着迷。后来我写了一篇万言长文来谈论这些作品，回

忆自己耽读它们时的情景：“那时节，虽然年纪很轻，入世未久，对黑暗窒息的旧社会却已经怀抱不满，渴望冲出现实世界，飞翔到广大自由的新天地里去。高尔基的作品，刚好投合了我的渴望。出现在那些作品里面寻求自由生活的善良而勇敢的人，曾经强烈地吸引我年轻的心灵，简直成为我理想的英雄。他们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那种即使饿着肚子也依然重义轻财的行为，连同他们穷苦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在我心目中都是世界上最美丽动人的东西。”甚至《马尔华》中对于海的充满感情和色彩的描绘，例如既是小说的第一句又是最后一句的“海——在笑着”，也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一幅奇异的永不消逝的景象。应该说，沉迷于高尔基的作品，是我青年时期读书生活中最感幸福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1936年6月间高尔基突然逝世的消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惊，一种很大的悲痛。参加完悼念大会，我们还久久地议论着关于这位革命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特别是他的死亡。当时苏联政府宣布高尔基是被他的阶级敌人——三名为他治病的医生暗害而死的。

正如《历史的哑谜》的作者所说的，高尔基是一个肺结核病患者，年事已高，而且是一位作家，并没有直接参预苏联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为什么竟会遭受医生的暗算呢？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因而在心里构成了一个疑团，一个“历史的哑谜”，长期得不到解答。自然，这个疑团或哑谜不仅并没有损害到我们对高尔基的尊敬，反而更激起对他的惋惜和崇仰。

这中间，一鳞半爪地传来了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某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而给我精神上最大触动的，则是发生在1936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访问苏联后所写《从苏联归来》一书引起的那场巨大风波。因倾心于建立起新制度的苏联，有两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先后访问了苏联，他们就是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表过题为《超出混战》的震惊一时的宣言的罗曼·罗兰，以及被看作是西方文化代表人物的纪德。他们都在高尔基的陪同下和斯大林会了面。因为这是文化界的盛举，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我们中国的报刊上也作了报道，还刊登了照片。当然，在苏联的新制度正受到歧视和怀疑的情况下，罗曼·罗兰敢于公开表示对它的同情并访

问了这个国家，自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也
在访问后对苏联作了赞扬，特别向公众显示了
自己和高尔基不同寻常的友谊。可是，纪德却
在离开苏联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无情
地揭露了已经建立新制度十八年之久的苏联社
会的种种弊端，如工农生活的贫困，生产的
落后，分配的不公，官僚阶层的腐败，特别是
斯大林对政敌和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残酷
迫害以及大规模的放逐屠杀。这本书无异是一
颗惊世骇俗的炸弹，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纪
德受到了包括像罗曼·罗兰和爱伦堡等作家在
内的人们的激烈攻击甚至辱骂。很多年以后，
爱伦堡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指责纪德道：“安德
烈·纪德于1936年来到苏联，他无条件地赞美
一切；但回到巴黎以后，却同样无条件地责备
一切。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别人的心是摸
不透的。”接着写下了一大段对纪德表示不满的
话，直至采用侮辱性的口吻称之为“扑火并非
因为它勇敢，而避开人们飞去也不是因为它
谨慎”的“一只螳螂”（《人、岁月、生活》第
四卷）。其实，爱伦堡的回忆录也记述到当年发
生在苏联国土上的种种弊端，使他感到自己“头